

海上社會轉型中的文心、文人與文化： 《易代文心——晚清民初的海上文化 賡續與新變》專書簡介[#]

呂文翠*

拙著《易代文心——晚清民初的海上文化賡續與新變》於2016年12月由聯經出版社出版。回顧從撰寫到出版的過程，前後長達八年，集結了曾刊登於兩岸三地學術期刊的單篇論文加以修訂改寫，最後統攝於「易代文心」的論旨下增補擴充而成。全書共七章原皆為歷年來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的補助成果，並於2017年獲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出版人文及社會科學專書」補助獎勵。可見本書付梓實賴各方人士與資源的襄助。



[#] 本文摘要、改寫自拙著〈緒論〉與〈後記〉。

*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我在〈後記〉中說這本書：「是期許自己能夠成為一個在文化迴流中更純粹享受路途風景的人。」這風景與人，是研究主體與對象間的「心」之關聯。這是一片由文人行動構成的人文風景：是洋場人際關係脈絡、是亞際文化交流的紐帶、是百美圖像的物質文化、是西洋當代新聞／歷史的漢語結撰與文類轉異。它們匯聚於海上（〈緒論〉述「海上」概念，是以上海為中心輻射擴散至東亞乃至泰西的人文地理學的深層內涵），跟隨王韜（1828-1897）的行蹤與經典譯介、時事觀察而越洋歐西，聯繫了上海——香港——東京而渾然一體。這是跨越晚清民初的歷史脈絡，更穿越歷史時段構成迴響與對話。

這片作為學術對象的風景是研讀百部書、行萬里路的產物。它是心靈的，也是客觀存在；它是理性思考的產物，也是感性的現場。我長期的閱讀、思索與研究是產生這片風景的動力，世紀初就開始了海外的移地研究，上海、北京、南京、蕪湖等地圖書館，以及 2012-2013 年赴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訪學時得以大量閱看燕京圖書館珍藏的晚清文獻，無一不是汨汨流動的學術資源。僅以上海而論，從黃浦江邊行走於舊日英租界的大馬路（今南京路）、四馬路（今福州路）、五馬路（今廣東路）的縱橫街區間，佇立於仁濟醫館及墨海書館（麥家圈一帶）、申報館、字林滬報館……，踱步在昔日隸屬法國租界的徐家匯藏書樓、天主堂周圍，比照著新舊地圖上海縣城內老城廂、豫園與文廟縣學的位置，洋場與上海縣的歷史遺跡在書本印證與當下懷想中重構出一個晚清海上的生活空間。十數年來在這些空間中往復行走，屢屢在物質文化的感應之外增加心得，在觀察與臥遊間還原當年文人才子的行蹤印跡。熟悉了王韜、韓邦慶（1856-1894）的行動軌跡後，更有了一重追問：他們當年的心智活動與精神空間得以復現嗎？

這就有了對「文心」的追索。現代大都市上海從開埠以來滄桑巨變，那是和政經變局有些參差的易代更新，時空轉換間的文心如何波瀾起伏、重新建構？其間有多少秉承舊傳統，有多少開闢新世界？這就轉換成日夜在腦際上映的風景畫面的斷續播放。易代的文心寄託於一個個不走或沒有走通科舉仕途的文人才子，他們是王韜、李善蘭、蔣敦復、管嗣復、韓應陞、蔡爾康、鄒弢、韓邦慶（書中將這一文人才子群體命名為「海上知識社群」）。他們來自松江、吳縣、常熟、浙江乃至香江，從遠近水路來海上洋場。吳中甬直王韜的船隻沿吳淞江來，韓氏叔侄（指韓應陞與韓邦慶）從松江水路繞九峰、越三泖而來，才子文人蜂擁至開埠後的上海。我屢次行走過最末代江南才子改琦（1773-1828，其所繪《紅樓夢圖詠》最著名，謝世後半世紀於 1879 年刻印）往來於松江府（華亭）和上海縣的路途上，不同的是他當年「打槳」乘船，我則搭長途汽車顛簸於府縣

之間，近幾年才乘上地鐵（捷運）、動車或高鐵。我從甬直而蘇州而洋場麥家圈，尋找王韜的文心現代化路徑，尋找他這個「長毛狀元」出逃香港的文字留蹤，在香港踏勘他編《循環日報》的「天行健」心跡，循著他的《扶桑遊記》至日本來建構亞際文化迴廊，遠眺他在蘇格蘭和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翻譯中國經典的時空。我雖不能全盤研究百科全書般的王韜，可是把握了他那顆文心，便大致得其文史貢獻。從松江舊城外圍臨河的韓氏祖宅（韓三房、南隸藏書樓、街坊有雷瑯祖宅）出發，循水系來到春申江畔，韓邦慶以「史例」跨越文類界限為青樓女子做「列傳」（《海上花列傳》）。其文心讓張愛玲（1920-1995）折服，1960年代中末葉她在美國波士頓查爾斯河（Charles River）畔翻譯《海上花列傳》、將吳語譯作國語，呈現海上繁華起落。「海上」之延展乃現代文化特質，「文心」之易是文人才子的人格之變，此一變完全植根於晚清「世變」。「海上」（概念界定詳見《易代文心·緒論》）不離水路交通，溝渠港汊、涇泖浜塘、江河湖海、遠洋洲際，水系交通相伴人際交往、物質文化交流，是這些在海上來來往往的洋場上人締造了上海這個大都市。以形式邏輯三段論概括我多年來的研究（呈現於《海上傾城——上海文學與文化的轉異，1849-1908》¹與《易代文心——晚清民初的海上文化賡續與新變》兩部學術專書）：

大前提：由明清兩朝的上海縣發展而為現代的大都市上海，洋場上外來現代物質文明之外，海上在地文化的現代形塑是重要成因。

小前提：十九世紀形塑現代海上文化的重要機制，是中國某類知識分子的知識與人格結構的轉型。

結論：為深入研究海上文化的形塑，須多面向揭示文人才子在海上社會文化轉型過程中的文心變易。

基於這個認知邏輯，我決定了《易代文心》的幾個研究面向：一、「新史學——動態的當代史與城市史」，探討文人才子在現代世界文史觀念與書寫方式的變化，其才子人格的蛻變與都市文化的關聯；二、「人情演義——世變與世故」，闡釋「說部」是才子與世俗社會的聯繫方式，中國小說體現世俗社會在世情或曰「人情」，晚清人情小說由韓邦慶推至頂點，張愛玲隔著太平洋對中國人情小說的隔世迴響，印證海上文心雖時空變換而不絕如縷；三、「『百美圖』像——文化時尚與性別展演」，分析《百美圖》從詩書畫一體的江南才子傳統分離出來，從吳門、金陵而進入海上，由吳友如主繪的《點石齋畫報》和現代印刷

¹ 該書於2009年由麥田出版社出版。

出版推動，轉化為洋場時尚的商業價值，進入民國更變易為性別展示的平臺。下面圍繞這三部分介紹本書基本內容。

晚清民初文心易代，外因在海上洋場發達的新聞、印刷便捷了傳播與接受，形塑了新型文化結構；內因是王韜等洋場才子順應天道循環、文化融匯、為人／文變通。王韜是重要節點，其經歷行為回應了當代史、時尚香豔等多重主題。他由經史子集而現代百科，一度為海上文運之軸心，呈現文史著述、新聞傳播、詩詞流布、中西及東亞文化交流和逸樂文化多重向度。王韜與理雅各合作翻譯介紹五經給歐西世界，《普法戰紀》（1873 年香港出版）開民間述外國當代歷史風氣，歷數十年完成由「紀」而「志」（《重訂法國志略》，1889 年上海出版）的歷史文類升格。王韜在香港辦《循環日報》，利用中西文字資訊、面對東亞世界的變化、痛切感受中國的思想文化政治體制的問題而發表旨在變革的政論，晚年在上海任格致書院山長，已將改革的急切之議轉為教育改良的遠景。然而過程中的主體往往存留舊才子的習氣，王韜在港時期所撰《海陬冶遊錄》雖把握洋場現代特徵，仍不脫《板橋雜記》流風餘韻，與他回上海（1884）後連載刊出的筆記小說《淞隱漫錄》相類，多篇呈現域外奇異視界，文體作法一仍《聊齋》。文人才子王韜一腳踏進了現代世界的大門，還留一條後腿在門檻內。就海上知識社群看，如王韜一般腳踏東西世界、自覺作變革文章者仍屬鳳毛麟角；次若蔡爾康、鄒弢者流，並無能力直面西方世界，但他們亟欲效王韜行事；更有海上文人群追隨時尚，出發點往往是覷出得利之機，這種人也有移風易俗的作用，是現代文化市場的主力。

王韜的現代知識結構映現於所撰法國史志著作。書中第一章討論〈海上法蘭西：王韜與東亞知識社群的當代史志書寫〉，論析晚清時期「海上知識社群」於上海始終面向世界的思想融匯與文化實踐。以東亞文化風景而言，傳統紐帶是文人才子的人際交往，第二章〈由《朝野新聞》看王韜與中日菁英社群詩文中的亞際文化融匯〉即欲復現 1870 年代末亞際文化迴廊上的生態。光緒己卯年（1879），居香港的王韜因《普法戰紀》盛名而受邀訪日，與明治維新初期日本朝野人士、清廷駐日公使及當時寓日華士多有交流。東京兩大日報《郵便報知新聞》、《朝野新聞》皆刊登其新撰政論文章、中日友人贈答酬和的漢詩。這些詩歌透過兩報轉載而形成文化迴廊，串聯東亞、應答歐西，捕捉了明治維新後日本學界著重撰譯外國史、新聞成為輿論公器的時代氛圍。他與日本幕末遺臣、《朝野新聞》主筆成島柳北面對來勢洶湧的西方文明潮流的深刻思索，於風月冶遊書中梳理個人與歷史之文化記憶，亦凝煉出城市史的現代書寫模式。

才子文心形成於「遊」，王韜主動與被動地往上海、香港、扶桑、歐洲遊歷過程中有一顆中國最早醒悟而懂得世界之「易」的文心。在上海、香港、東京三城之間的新聞及其刊載詩文的流轉溝通中，王韜是指標人物，亦堪稱引領群倫。第三章〈冶遊、城市史與文化傳釋：以王韜與成島柳北為中心〉探討冶遊文學在晚清上海以及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東京城市文學發展過程所起的作用，特別關注明清之際著名文人余懷記述南京秦淮河畔青樓文化興衰的《板橋雜記》之影響印痕。晚清海上文壇仿者甚多，王韜以滬地青樓北里滄桑寄寓家國身世之感的《海陬冶遊錄》便是著名例證。成島柳北的《柳橋新誌》說明了從十九世紀中葉以降的東亞視域來看，《板橋雜記》作為東亞漢文學圈共同的文化資源，更提供嶄新視角審視晚清時期「漢文學」在西潮東漸的文化語境中如何傳釋與轉化，並與在地文化碰撞出複雜多元意義。

第二部分論傳統說部及人情與現代文化結構性關聯的易代體現。賡續於韓邦慶一脈，張愛玲將政治現代性的王韜與洋場經濟現代性的韓邦慶，輕輕締結於港戰中的人際關係上來，〈香港的文學「易」代：從王韜到張愛玲〉(第四章)、〈五評《紅樓夢》，三棄《海上花》？——張愛玲的人情文學系譜〉(第五章)有深入探析。韓邦慶閱洋場與工商背景上活動的校書、狎客、捐客、鄉愚無數，參透現代世故人情，把中國人情小說推向高高的巖頂，開啟後世都市文學。張愛玲的香港經驗成為她中晚年後重要創作資源：她一邊寫香港經驗的國際大變動中的人情(《雷峰塔》和《易經》、再合二而一凝聚為《小團圓》)，一邊研究《紅樓夢》、翻譯《海上花》。她筆下的戰時香港與上海，於不太平和的人際關係中穿插藏閃著人情征戰。後世的反思者張愛玲不甘「看官們『三棄海上花』」，全力找回被丟失的文心。海上文人韓邦慶面對急速變化的易代淞濱，面對海上洋場發聲，他高度節制的「穿插藏閃」結構藝術將意圖控制在隱喻層面，竟至使《海上花列傳》成為一個在其當世及身後數十年意義未被釋放的寓言。數經易代，張愛玲才解開韓邦慶藝術符碼的程式，理解他的深邃文心。

哈佛歲月為張氏人生轉捩點。我幾度拜訪波士頓劍橋區哈佛大學 Radcliffe 學院附近張愛玲故居，尋繹她在此兩年(1967-1969)的印跡。時張愛玲赴美近十二年，挫敗於英文小說難出版、衰年丈夫病篤，輾轉多方尋求大學研究資助，幸而終能獲得一份女性「獨立研究」的獎助金，基本保障了生活。《海上花》英譯計畫開始不久，七十六歲的賴雅(Ferdinand Reyher, 1891-1967)在多次中風後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四十七歲的她處理完丈夫後事，在此地待足了兩年，計畫結束後才離開。此後是張愛玲寫作與翻譯的又一個高潮：《紅樓夢魘》與《海

上花列傳》的英譯與國語譯本、〈色，戒〉、〈浮花浪蕊〉、〈相見歡〉，以及生前從未出版的《小團圓》……等，冷凝文字飽蓄微妙的騷動與張力。

張愛玲的文學譜系建立在曹雪芹、韓邦慶的人情寫實基礎上，她立足於普世的悲歡離合、在人情小說的流脈與小說美學平臺上重新估定《海上花列傳》的文學價值與地位。她從 1960 年代開始投入《紅樓夢》考證與英譯及國語註譯《海上花列傳》，認為《金瓶梅》、《紅樓夢》一脈相承，而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上承《紅樓夢》的人情文學系譜，為它遭長期忽視而不平，這透露出她企圖凸顯中國近代小說的人情表述與愛欲書寫之重要意義，並隱以傳人自況。韓邦慶除了筆記小說文類（《太仙漫稿》）與王韜等有交集，虛構的章回小說《海上花列傳》追隨者眾多，《海上塵天影》（鄒弢著）、《海上繁華夢》（孫玉聲著）、《海上青樓圖記》、《海上遊戲圖說》、《海天鴻雪記》（二春居士著）等書甚囂塵上，蝕損了始作俑者的光華，是海上文化市場行銷至上的諷刺。

最後一部分欲從百美圖「相」的脈絡組建出更大的文化結構並多方映射文心。第六章〈點石飛影·海上寫真：晚清「百美圖」敘事的文化轉渡〉與第七章〈民初海上「百美圖」時尚敘事與性別文化的塑形嬗遞〉兩章梳理自明末至民初的百美圖敘事傳統的轉型衍變過程，聚焦探討清末民初「百美圖」幾次三番變相，呈現出媚、美、豔、學（生）的脈絡過程。

明末清初宛翁子編《吳姬百媚》品評吳中媚者，不外琴棋書畫與風月，集合關於妓女的溢美詩歌；稍後同類型有《金陵百媚》，置景多用梅蘭竹菊襯托人物氣韻，品格標榜仍延續《吳姬百媚》路數；清中期顏希源所輯《百美新詠圖傳》立意迂闊，選取標準和排列秩序儼然王朝正統；清中後期海上仕女畫家改琦的《紅樓夢圖詠》則在小說想像基礎上再度想像，其虛構的價值取向恰與顏希源相反；晚清海上／洋場才子王韜、蔡爾康、鄒弢等的豔史、宮閨譜系、冶遊指南的文字建構並不能保證並行的圖像的藝術水準，《上海品豔百花圖》（鄒弢評定）圖像畫面亦未能興起一種個性化的審美欲望，反而風行俗濫；此後群起的媚美圖像的畫面品質的提升有賴參照攝影，但摹繪細節的真實終究不能賦予畫面豐富內蘊；吳友如所繪《海上百豔圖》（刊於其創辦的《飛影閣畫報》）圖像主要是帶有情節性想像的婦女居家的各式生活內容，圖集亦有多幅表現洋場妓女生活，呈現出華洋雜處的物質元素滲透到民間與妓家的環境布局中。一面傳承古今媚／美傳統，一面對海上洋場女性「寫照傳神」，吳友如標誌了富有寫實特徵的現代海上景象之誕生。民初上海文藝圈畫報、書籍「百美圖」的創作主體打破以褒讚之名行拘限之實的百媚／百美／百豔繪畫傳統，最終歸結於對新女性身

分（女學生）猶然參差的駁雜意涵。概而言之，清代「百美圖」呈現香豔傳統與物質文化結合漸變為海上文化標誌，民初圖像的媚美傳統轉化為以女學生的形象身分為主，在開啟民智與自由獨立的意識背景上更顯性別文化之多面意涵。

「易代文心」作為專書出版而保留論文單獨發表的印痕。承續橫向與縱向脈絡，自王韜因應變局而作的政論呈顯其欲建構「大我」家國歷史敘述為始，繼而探究張愛玲自承挖掘「小我」面相而遠離大敘述所帶出的文化省思、人情美學，再從文化研究的視角，通過清末民初海上文藝圈林林總總的「百美圖」書籍，重現文人文化私情論述與香豔文學傳統在晚清民初上海文化圈的變遷歷程，反思其如何影響及創造了近現代文學的書寫範式，轉渡為更具活力的文化創見。冀盼深度考察易代之際文心異變的軌跡，具體呈現晚清民初海上文學文化賡續與新變的動態圖景。

在個人的長期寫作計畫「海上三書」中，《易代文心》的出版可算到達了預定三分之二的路程。望著手中正執筆的第三部「海上書」的初稿大綱，驀然一驚，近二十年學思書寫生涯無時不與這片廣袤無垠、變化萬端的「海上」風景為伍，正是它們豐富了我的生命樣貌，並由此不斷地開啟嶄新的人世風光！